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

(1518—1667)

邹翔 著

Also, an aduise set downe vpon her
Majesties expresse commaundement, by the best lear-
ned in Physicke within this Realme, concerning the appoynt-
ment and relief of the poore, the best charge in the manner
of people, as wel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ame
as for the curing and ordering of them
as for the curing and ordering of them
as for the curing and ordering of them

Imprinted at London by Christo-
pher Barker, Printer to the Queenes
most excellent Maiestie.



人民出版社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

(1518—1667)

邹翔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柴晨清

装帧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邹翔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517-3

I. ①鼠… II. ①邹… III. ①鼠疫-防疫-医学史-伦敦-1518~1667 IV. ①R184.35-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5422号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

SHUYI YU LUNDUN CHENGSHI GONGGONG WEISHENG(1518-1667)

邹翔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00千字

ISBN 978-7-01-015517-3 定价:2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关于近代早期英国伦敦各界抵御鼠疫疾病的史学专著。自人类产生,人与疾病便成为一对天然的伴生物。诚如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插图医学史》所言:“人类自群居以来,就开始了同‘疾病’这一文明伴生物的斗争。”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与疾病史、医疗史也就自然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命健康和人种的世代繁衍,与人类社会的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彼此交集,相互影响,关系十分密切。疾病与世界历史的关联程度,已经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高度重视。因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而声誉鹊起的美国史家威廉·H.麦克尼尔,随后又发表新著《瘟疫与人》,将疫病纳入人类历史变迁的宏观范围予以考察和反思,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和见解。其中有关西班牙殖民者以区区六百人队伍、征服美洲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的疫病原因分析,给众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兹特克的印第安人之所以最终溃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染上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天花。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印第安人一旦碰上这种从未接触过的疫病,毫无免疫能力和应对之策,战斗力大伤元气。麦克尼尔认为,传染病为人们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轻易征服美洲提供了一把钥匙,并且也为史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

疾病史本来属于医学学科里医学史的研究范畴,由学医出身的学者治学,需要专门的病理和医疗知识作为基础,具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科技史的色彩。历史学家在探索不同时期重大问题,虽然也会遇到疫病发生流行的影响因素并加以探讨,例如史学界对于“黑死病”与西欧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义解体的关系,就有一批研究成果程度不等地予以阐述。但是,作为国别性疾病专史研究来看,这类著述的学术积累毕竟还不是那么丰硕,与根底深厚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无法相比,甚至显得有点“另类”,似乎不太容易得到史学界同仁的青睐。不过,受国际史学潮流影响,国内习史者涉足疫病史、医疗史的人数正在悄然增加,中青年学人尤其突出。检索一下比较晚近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可以从一个方面获得这种印象。自2002年以来,仅中国史方面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就有2篇属疾病史研究,一篇研究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另一篇研究年1820至1953年间江南的传染病史,时至今日,论文获奖者余新忠、李玉尚教授已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中坚力量。

本书基础也是一篇博士论文,曾获2009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和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主题为16、17世纪英国伦敦的鼠疫与公共卫生。作者邹翔在研究中划定的基本时间框架,始于英国政府开始发布防疫文告的1518年,终于1667年伦敦大瘟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15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防疫法令、隔离检疫、医疗救助、公共卫生,经历了一番近代早期的探索、尝试和运作的过程。1665—1667年大瘟疫是伦敦最后一次爆发鼠疫,之后鼠疫在伦敦乃至整个英格兰基本消失,构成英国疫病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考察的时段位于英国 19 世纪工业化时期大规模公共卫生改革运动之前,疫病预防和医疗救治的条件都还比较有限,而鼠疫又是一种传染性和危害性极强的疾病,疫病频发乃至大疫爆发蔓延,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异常严峻的挑战。伦敦当局和社会各界如何应对挑战,鼠疫基本消失的原因何在,自然成为本书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全书以传统疫病应对机制的缺位为导入口,从医疗界、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的法令法规、隔离检疫和公共卫生整治等四个方面分层论述了伦敦此期的整个应对鼠疫的过程。

作者对于当时医学进步和疫病防治以及医生的医德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伦敦医学界在面临严重鼠疫时总体上显得软弱无力,从而导致以政府为主导的鼠疫应对活动逐步增强。通过缜密解读《王国法令》和伦敦市政当局法规指令里有关鼠疫防治文献的原始材料,作者认为王国政府和伦敦当局高度重视应对鼠疫的立法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法令法规。书中可以看到,其观点均以一手材料为依托,作者搜集资料之勤,解读条文之细,体现了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在此基础上,本书转入全书的重点章节:隔离检疫政策的推行。作者对于伦敦各界的政策反应进行了动态的检视,指出市政当局最终与王国政府协调行动,实现了严格隔离,而伦敦所有阶层和不同群体则经历了一个逐渐接受隔离的过程。这种观点较好地贴近了当时复杂的历史场景。关于 1666 年大瘟疫以后、伦敦乃至英国鼠疫消失原因这一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本书就已有观点逐条进行了深入辨析,认为完全从生物学、传染病学上考虑原因的看法存在诸多疑点,而检疫、隔离及其他卫生条件的改善,对于防止鼠疫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针对一

些英美学者对于近代早期英国公共卫生成就的低调评价,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以防治鼠疫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他卫生改革,显示了英国公共卫生由应急到常规和制度化的转变,并且进而得出全书结论,即16、17世纪伦敦政府在应对鼠疫逐步形成了有组织的隔离制度、疫情上报制度、环境卫生整治制度以及适时的医疗救助,成为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典范。

作为学术研究,以上观点特别是最终结论是否完全得当,史学界学人自可切磋讨论。疾病史在国内尚属成长中的新兴领域,还有大量基础性和专题性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但是就邹翔这一研究的具体课题和内容而言,本书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大致属于首例,其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和鼓励。作者于2008年在武汉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坚持英国近代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发表了多篇专题研究论文。前些年她又远赴牛津大学医史研究中心从事学术访问,向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玛格丽特·佩林(Margaret Pelling)、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等社会史、医疗史名家请教学习,在学术视野的拓宽、史料的收集研读和史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获益良多。其完成的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验收时被评为优秀,这些进展令人鼓舞。由以上情况推而广之,人们可以看到,尽管起步较晚,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国大陆中青年学人在疾病史领域的研究力量正在逐步生成集聚,由微渐著,所饱含的人文关怀之情和学术砥砺之力足可称道,发展前景喜人,是为序。

陈 勇

2015年秋末初冬于珞珈山南麓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伦敦鼠疫的频发与应对机制的缺位	18
第一节 16、17 世纪伦敦的鼠疫.....	18
第二节 鼠疫频发的原因	25
一、环境污染严重	26
二、居民生存条件恶劣	31
三、气候原因	34
第三节 鼠疫的社会危害	36
第四节 传统疫病应对机制的缺位	47
一、教会在传统疫病应对上的作用	47
二、宗教改革与疫病应对机构的缺乏	53
第三章 16、17 世纪伦敦的医疗界及其对鼠疫的应对	56
第一节 医疗界的利益竞争	56
一、正统医学与民间医学	56
二、正统医生与民间医生的论争	60

2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

三、竞争的结果	68
第二节 医学科学的发展状况	72
一、医学科学的进步	72
二、疾病与健康观念的变化	75
第三节 鼠疫的预防	77
一、清除污秽	78
二、卫生保健	81
第四节 鼠疫的临床治疗	86
一、从医人员的匮乏	86
二、鼠疫的临床治疗	90
第四章 防疫律法的颁行	95
第一节 应对鼠疫的原因	95
一、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95
二、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	98
三、欧洲大陆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影响	100
第二节 王国政府的法令	101
一、1518 年法令的制定	102
二、1578 年法令	105
三、1603—1604 年的王国“鼠疫法”	111
第三节 伦敦市政当局的指令规章	116
一、1625、1630 年的伦敦指令	117
二、1646 年的伦敦指令	117
三、1665 年的市政厅指令	122

第五章 直面鼠疫——隔离检疫政策的推行	125
第一节 隔离的执行人	125
一、警察	126
二、搜尸人与尸检人	128
三、岗哨	130
四、护士	132
第二节 隔离政策的推行	134
一、家庭隔离	134
二、建立隔离医院	139
三、整顿丧葬	144
四、关闭剧院、禁止集会	148
五、口岸检疫与隔离	151
六、隔离的特点	155
第三节 隔离检疫的社会反应	160
一、宗教界对隔离检疫政策的反应	160
二、伦敦市政当局与防疫政策	169
三、民众与隔离政策	176
第六章 公共卫生整治行动	182
第一节 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的重视	182
第二节 编制死亡人口统计表	188
一、死亡人口统计表的演变历程	189
二、死亡人口统计表的编制	194
三、死亡人口统计表的可信度与意义	197
第三节 政府的医疗救助活动	200

4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

一、医疗救助的方式、方法	202
二、医疗救助的意义与局限性	205
 第七章 政府防疫政策的结果	209
第一节 鼠疫的消失与政府的防疫政策	209
一、鼠疫的病原学原理	209
二、鼠疫消失原因的分析	212
三、政府政策与鼠疫的消失	215
第二节 防疫政策与社会秩序的整肃	217
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217
二、防疫与社会控制	221
 结 语	225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5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

鼠疫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当中,鼠疫多次大规模爆发,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从上古的罗马、希腊到中古的拜占庭与西欧,再到近现代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有鼠疫造成的恐怖阴影,从古人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在鼠疫危害面前,人类所扮演的从来都不仅是受害者的角色,自最早有鼠疫记载的上古,人类就开始了直面鼠疫的防疫行动。在鼠疫频发的压力之下,近代早期的英国伦敦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防疫行动。

一、学术与现实意义

上古时期,由于医疗技术落后,社会组织机构不健全,鼠疫的应对比较原始,效率低下,很难发挥大的作用。在中世纪,教会在防疫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救助病人的功能,很多教会人员为了疫病的防治不惜献出生命。但是由于教会的宗教特性,中世纪的防疫也就带有了宿命、天启等超自然的观念,部分防疫措施不仅无益,反而有害。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类应对疾病的手段不断丰富,防疫行动的组织与管理也

不断系统和完善。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直到近代早期,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防疫体系,他们颁布法令,有组织地隔离病人。如意大利、法国以及西班牙等国家先后开始的防疫行动,为后世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到了19世纪,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疫抗疫系统。现代学者将各种传染病及其应对行动统称为公共卫生。^①

鼠疫是一种疾病,当鼠疫爆发作用于人类社会并有了人类的防疫行动——公共卫生活动之后,它就超出了疾病的范畴,而带有了社会人文的意涵。目前,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将历史上的鼠疫置于特定文化、社会的背景下,分析它与社会环境、文化习俗、精神心理状态、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等要素之间的动态、有机联系,而历史学研究者也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历史上的疾病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是历史学研究中的疫病史。

在西方,疫病史的研究已有比较长的学术发展史,如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就出版了很多有关疫病的传单、小册子,作者引经据典为当时人防疫提供借鉴。例如1625年伦敦市政厅印发的《红十字:或上帝的垂怜》(City of London, *The Red Cross; or England's Lord*

① 公共卫生这一名词的定义,在学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书的公共卫生主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公共卫生的定义,即:公共卫生是一门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心理和躯体健康,并能发挥更大潜能的科学和艺术,其工作范围包括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进行个体健康教育,组织医护人员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发展社会体制,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其健康地出生和长寿。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公共卫生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利用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成就来改善和保障人群的健康、预防疾病。它的医学基础是预防医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群。参见叶莘莘主编:《预防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have mercy upon us, 1625), 就对黑死病的传播与爆发规律进行了分析。众所周知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也写下了《伦敦大瘟疫亲历记》一书,该书出版于 1722 年,伦敦大瘟疫之时笛福只是一个 5 岁孩童,很难有如此好的记忆和细致的体悟,说成“亲历记”有些勉强。但是,这部著作若视为笛福所写的瘟疫史,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人对瘟疫的关注。对疫病史的大量关注是从 19 世纪开始的,那时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行公共卫生建设,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应对疫病的经验和答案。英国在其中尤为突出,当时就出现了不少医生、学者书写鼠疫以及其他传染病历史的现象,《不列颠瘟疫史:从公元前 664 年到鼠疫的绝迹》(Charles Cre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就是极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本书分两卷,分别在 1891 年和 1894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如今仍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作者查尔斯·格雷顿是英国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人文学者。

疫病史的研究者最初主要是医生,但是如前所述,当疾病作用于人类社会并引起一系列反应之后,疾病就不仅仅是疾病本身,它不是医生能够给予充分解释和说明的。因此,学者们提出将疾病置于社会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中进行探讨,研究疾病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以此窥探人类历史的另一种变迁,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就是医疗社会史研究^①。随着它的兴起,疫病史研究获得巨大进步。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者认为应该将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进行

① 医疗社会史是 20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率先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产物。1970 年,西方的医疗社会史协会正式创立,至今已经有了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

结合,并指出,如果不将医学史的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不仅达不到历史学家所期待的从医疗的角度折现历史变迁的目的,也难以对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进行正确把握。为了更好地推动医疗社会史研究,目前的西方医学史研究者引入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如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实现了跨学科研究,使得医学史发展成为极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以英国为例,维尔康医学史中心就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地,形成了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者在内的庞大的研究队伍,使医疗社会史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奇葩,而疫病史就是医疗社会史研究中的“显学”。

在谈到英国的鼠疫时,人们会将视野投向1345—1348年的黑死病,也会关注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而对近代早期,亦即16、17世纪的鼠疫所谈甚少。在涉及英国的公共卫生建设时,人们也将更多的关注投向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对其之前的公共卫生建设基本不做深究。实际上,在近代早期,鼠疫一直困扰着英国,尤其是伦敦,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鼠疫的重灾区。在这近150年的时间中,伦敦的鼠疫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由于它的地区性、频发性,以及它不像黑死病与伦敦大瘟疫那样集中爆发和惨烈,而不为人们所关注。在近代早期,有频发的鼠疫,也有社会积极的防疫行动,亦即公共卫生。但是研究公共卫生

研究的地域上,从最初的以西欧和北美为主到如今包括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在研究的课题上,从最初的医学名人、医疗记录到后来的疾病和社会以及医疗市场、病人陈述、性与性别的解释、疯狂医学伦理、流行病学、医学教育等等,十分广泛。参见李化成:《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史的学者并不太关注近代早期的公共卫生建设,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有学术的,也有现实的。事实上,从近代早期,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行动已经在英国开始,但是涉及此时期公共卫生的学者们大都会称赞同时期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在公共卫生上取得的成绩,而指责当时英国公共卫生的滞后性,批评英国政府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如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夫·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在他的文章《英国的瘟疫》(载于《鼠疫的再思考》,该论文集是《地方人口杂志》1977年出版的增刊,为疫病史专家的论文汇编)中就提出,当时英国没有像法国、意大利那样成立卫生局、进行严格隔离等,并不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公共卫生不负责任,而是由于英国政府机构的组织形式不同,由此导致公共卫生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造成的。而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王国与各级政府对鼠疫的应对都是非常积极的,至于最后的效果如何,那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决定的。从牛津大学 Bodleian 图书馆保留的大量的 16、17 世纪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英国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确实做了很多努力。

学者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争议,恰恰说明了社会史角度切入疫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些仅从疾病层面无法做出解释的问题,可以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和分析。而且,近代早期的伦敦社会是复杂多变的,这是一个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特殊时期,诸多社会要素都处在变动之中,把握这个时代对于理解近现代伦敦乃至英国的社会发展非常重要,而从疫病史切入伦敦社会史研究,也会为近代早期英国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挖掘出新的历史问题。

鼠疫与近代早期伦敦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互动的、不断变化的,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近代早期伦敦的疾病、卫生及其与国家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关系,这对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的理论与成果

本书以1518—1667年伦敦的鼠疫与城市的公共卫生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伦敦的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也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并在自己反思中形成的。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时空的鼠疫问题,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有直接关联的著作只有几部,而且与本书的时间断限有所不同。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与鼠疫有关的各个具体的研究侧面上,包括疫情与死亡率、检疫与隔离、环境卫生等等,数量不多。不可否认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前人研究成果中,不乏学术影响很大的著作和论文,一些学者也是享誉全球的疫病史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笔者的影响很大,使得笔者深受启发。笔者对前人的学术成果及其理论方法进行了梳理和分门别类,以期比较全面深刻地把握近代早期英国疫病的学术史。

(一)在对鼠疫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两部。第一部是威尔森的《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鼠疫》(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这是一部系统再现1563—1645年期间伦敦鼠疫的力作,文章以年代为序,详细地叙述了不同年份中鼠疫爆发造成的危害、人们的反应以及政府的作为。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长于叙述,主要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写,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为我们全面了解这一时期